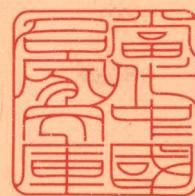


当代
—
中国
—
名家
—
文库



史学、经学与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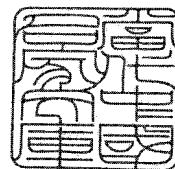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刘家和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
名家
—
文库



史学、经学与思想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刘家和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 刘家和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当代中国名家文库)
ISBN 978-7-303-15828-7

I. ①史… II. ①刘…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②经学－研究－中国③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K092
② Z126.27 ③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927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SHIXUE JINGXUE YU SIXIA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6.25

字 数：38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划编辑：刘东明 责任编辑：刘东明 李春梅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菁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序

这本小书收集了我近十年来所写一些主要论文，凡二十一篇。原来以为，这些拙文平平庸庸，编起来与其说是供人参考，不如说是更便于接受多方面的指教，还写什么序言？可是，出版者的盛情难却，就只好写了。那么，又该写一点什么呢？想了许久，觉得读者在见到此书但尚未批阅以前可能就有一些需要事先了解的问题，所以就以设为问答的形式来下笔。

或问：这既然是一本论文集，为何不直接题为某某文集或用一个书斋雅号之类的词来作文集之名，却用“史学”、“经学”、“思想”这样一些概念外延既广而内涵又极丰富的词语来作书名呢？名实能相副吗？

对曰：这正是我首先要说明的问题。文集如此题名，非敢虚张声势以表示它能囊括一切史学、经学与思想之内容，其实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题书名，那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涉及了这三个方面，不出这三个方面以外。如果说此外还有一点微意，那就是就个人学力所及的范围说明此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探讨中国历史与史

学之特点。当然，我知道，兹事体大，而个人学力有限，姑且作一些粗浅尝试，如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算万幸了。

或又问：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涉及这样三个方面？

对曰：这就要说一点个人的读书学习过程了。从早年读中国典籍的时候起，我就是在经史不分的状况里度过的，《春秋》《左传》是经是史？这个问题原先基本没有想过。以后，我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研究古代印度史的时候遇到了“经学”的问题，即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经学问题；不过，那些经学只是其历史内容的一部分，而与史学无关，甚至“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那些宗教的经学所关注的终极目标在于彼岸世界，而史学所关注的目标的最大极限仍然不出此岸世界。在古印度的学术史上，既然宗教的经学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为史学留下的余地自然也就不多了。

在研究古希腊史的时候，不难发现那里有发达的史学。不过，那里有百家之学（在中国称诸子之学），而无经学。如果一定要找出与中国经学相类似的义理之学，那就是哲学。可是，古希腊的哲学植根于逻辑理性的土壤中，坚信真理只能在永恒的不变中去把握，具有实质主义（substantianism）的特点，而实质主义具有反历史的倾向。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史学之间也有一条鸿沟。而且，古希腊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为纯思辨的学问，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求任何具体的实用之价值，所以也与史学之重总结历史经验的经世致用目标颇异其趣。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史学与经学，而且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密切。中国的经学（甚至诸子之学）则一般皆植根于历史主义的土壤之中，坚信真理只能从变化的动态中去把握，具有反实质主义的历史倾向；所以，史学与经学之间相互沟通。而且，中国古代哲学主体为历史智慧之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所以与历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标恰好互为表里。

正因为这样，在我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时候就感觉到无法离开经学。特别是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重在先秦、两汉阶段，所以尤其深感二者的相辅相成，惟其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或又问：“六经皆史”之说，可说人所共知，你现在还强调经史关系密切，又有什么自己的新特点呢？

对曰：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李宗侗教授又把这一观念追溯到唐

代，其实再上溯到司马迁也是可以的。可以说，从司马迁到张之洞，不知有多少学者谈到了经史关系的密切。他们或从义理推求的角度，或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包括文字训诂）发现了二者关系的密切。对于这些，我深深受惠于前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如果说拙作还有一些微小的新意，那就是：我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再认识中国史学与经学关系的特性的，此其一；又窃以为，以史学与经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历史与学术思想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特殊个性与中西异同的理解，此其二；而且，我试图通过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密切关系的研究，来探讨中西古代理性结构的异同，试图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中西文化特点的异同，此其三。当然，对于我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奢望，它很难在我这样学力有限的人身上得到实现；不过自己总有一种不能自己的学术冲动，心向往之。个人学术研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只要认真严肃地做，即使失败，其错误的教训也可以从反面有益于来者。

或又问：你说了经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那么，书名里的“思想”二字又有何着落？

对曰：经学与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一向有两重关系：一为文献考证方面，二为义理推求方面。经学的论证基本上是以历史的论证为基础的，而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正好为经学的论证提供了史料的基础。从前有一篇拙作《史学与经学》，那就是从这一层面讲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的。应该说，经学与史学之间更为内在的关系则在于思想的层面上。所以，要研究经学与史学，就不可能离开思想。经学与史学的对话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具体的思想的场合（context，或译语境）中进行的，离开历史与思想，经学和史学就既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又失去了相互对话的条件。

因此，“思想”一词也出现在书名之中。当然，这绝对不表示这一本小小的拙作就能涉及全部的中国历史与思想史，其实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书名里题有“思想”一词，只是说明，我在探讨经学与史学的时候没有敢于忘记了思想而已。

或又问：你的这一篇文章选集，所展现的是各篇文章的“单兵训练”，还是文章之间也有一点内在关联的“队列训练”呢？

对曰：此书既然不是按篇章节目的体例撰写，而是一些文章的编集，那么自然不能有精密的系统安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队列训练”，而只能是论文的“单兵训练”。不过，倒也不是一盘散沙的“单兵训练”，其中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关联的。这本小书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七篇，第二组七篇，第三组七篇。谨略述三组分划的微意如下：

第一组，重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一篇谈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它反映了我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从逻辑角度的一些思考，探讨了比较研究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我的研究既然以比较研究为出发点，所以也就权以此文来为本书作一场开场锣鼓。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留有一些要继续深入说明的问题，容待将来续论。

随后三篇文章讨论中国传统史学里的两个理论问题，即求真与致用的问题和变与常的问题。关于前者的文章二篇，前一篇对史学求真与致用作一般理论性的探讨，后一篇专就先秦史学的求真和致用作具体的分析；关于后者的文章一篇，讨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的问题。与古代希腊的形而上学的求真无关致用不同，中国古代史学重视二者的统一；与古代希腊的形而上学重在从常中把握真理不同，中国古代史学深究变与常的内在关系。应该说，中国古代史学对于这两对范畴的丰富而发人深省的探讨，其中时时闪烁着历史理性的光芒，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全世界人的珍贵文化遗产。我的讨论，大抵都是初步的，希望以后能够继续有所深入。

再以下三篇都是关系到中外史学比较之作。其中第一篇讲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是以古代中国、印度及希腊来作的比较；第二篇讲通史，意在说明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或者体现着历史理性的通史，只有中国才有，而为古代希腊所无；第三篇讲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是在分析中国古代理性结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理性的优先的或支配的地位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述，虽未直接具体地讨论古代希腊，而实际上是以古希腊的逻辑理性在理性结构中的优先或支配地位为参照系的。总之，这一组文章，虽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主，但实际上则不离中外古代史学思想与理论的探讨。

第二组，重在经学及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儒家经典中与史学关

系最为密切的莫如《尚书》《春秋》与《左传》，金毓黻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中曾经辨析“六经皆史”之说，以为五经中唯《尚书》与《春秋》（含《左传》）可以称为史学，其余各经只能视为史料，所见极是。所以我在探讨史学与经学关系的时候主要也集中注意于《尚书》《春秋》及《左传》。又考虑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看本国典籍时可能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蔽，所以在这一组文章中首先安排了四篇评论外国学者的《尚书》《春秋》及《左传》研究的文章。在此四篇文章中，前两篇是论 19 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译注的《书经》（附《竹书纪年》）（与邵东方博士合作，他主要探讨《竹书纪年》的，第三篇是论理雅各译注的《春秋》《左传》（东方及费乐仁博士曾参与讨论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理雅各的资料）的，第四篇则将理雅各的《左传》研究与 19 世纪日本学者安井衡的《左传》研究作了一番对比的探讨。理雅各在其中国友人王韬协助下遍译中国经典，每译一书必就版本源流、前人成果、思想内容等方面做一长篇引论以为系统之探讨，译文之于可商榷之处也往往注出异说，并说明自己译文之根据。他的翻译和研究在当时甚至今日皆不愧为一流之作，他对《书经》《春秋》及《左传》的某些见解对中国学者是很有启发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尤其因文化背景的限制，他的理解以至译文皆有可商之处。他要帮助中国人打破对于儒家经典的迷信，可是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若干积极方面也无法理解。拙文则从文献根据、文字训诂、译文正误、思想见解等方面对理雅各的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安井衡也是一位博通中国经子之学的学者，曾注释多种经书、子书。他的《左传辑释》对于《左传》中所蕴涵的民本思想有着敏锐的理解和把握，并认为这体现的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国人之治《左传》者往往重视日本竹添光鸿之《左氏会笺》，以为所收训解丰富，如就思想深度而言，后起之竹添书盖不如其前修安井书矣。通过比较研究，窃以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神化儒家经典，制造迷信以愚民，这是必须彻底摒弃的；但是其中的民本思想仍不失为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应当有分析地加以发扬光大的。

随后三篇涉及一些经学本身的问题。首先谈自 1936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至今仍在不断翻印的那一套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里的第三册

《春秋三传》的底本问题。这本书把《春秋》和左氏、公羊、穀梁三传放在一起，而且还有许多评释与附录，甚便读者，但其中问题（尤其在思想方面）也不少。世界书局原编者故意隐瞒此书的真正底本，更加令人怀疑重重。这一小文以清康熙时期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今《春秋三传》相比较，剖析其异同得失，说明治经学者不宜忽视版本问题，出版者不说清版本源流乃学术上之一大忌，不知而乱说则尤其不可。下一篇论孟子与儒家经传，说明儒家经学的最初起源与思想倾向。最后一篇从清儒臧否中看《左传》杜注，就此一个案论证清儒在文字训诂等微观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宏观见解方面之不足之间的张力，说明清儒成果对于我们既是宝贵资源但又不是不可突破的最高极限。我们的经学研究必须自觉地保持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第三组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因为写作时并无明确一致的目标，所以不如以上两组文章那样论题集中。不过，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经学与史学关系的内容的。第一篇讨论殷周关系研究史中的问题，其本身可以说是考证性的史学史领域的文章，不过其所涉及的核心事实却是中国大一统思想源头上的一个关键点。第二篇论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讨论了儒家经典与诸子著作中一个殊途同归的思想，即关于统一的思想。第三篇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讨论的是儒家将作为亲亲之爱的孝道扩充为天下一家思想的伦理根据的问题。因此，这三篇文章可以作一个小的类来看。第四篇讨论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关于人性恶的问题的见解，辨析其间之异同；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说体现了儒家经学中的一个思想根据，那么荀子的性恶说则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经学的又一个思想根据。孟、荀二人可谓殊途同归。第五、六、七三篇文章讨论《左传》和《公羊传》的经学思想。论《左传》文讨论其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前述的安井衡书虽已有所涉及但未及深入的问题，此文特别加以申论发挥。论《公羊传》或汉代公羊学的两篇文章则一篇讨论其中的历史统一观，一篇讨论其中的历史发展观；窃以为，不论汉代公羊学里有多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但其主张的中国历史在连续中统一、在统一中发展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出色的。我认为，公羊学里蕴涵着一种历史哲学，而这一点是理雅各所无法理解，而安井衡也未能见到的。

关于这本小书，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如果能蒙读者诸君有所见教，则不胜企望感激之至。

2004年4月初识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寓庐愚庵

目 录



序 / 1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 1

-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 2
-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 3
-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 6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 11

-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 11
-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 14
-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 16
-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 19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 23

-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 24
-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 30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 38

-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 38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 42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 45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 49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 49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 51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 54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 61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 70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 71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 76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
之原因 / 82

论通史 / 90

一、问题的提出 / 90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
“通史”之异同 / 91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 95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 101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析论 / 104

一、引言 / 104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 108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 124

四、结语 / 141

引用书目 / 142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167

引言/167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168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185

结语/199

理雅各英译《春秋》《左传》析论/200

一、理雅各氏译《春秋》经兼收《左传》/200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

怀疑与不满/202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207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211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220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228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228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233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237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241

一、问题的提出/241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242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244

孟子和儒家经传/247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247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250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252

四、孟子的述经与论史 / 256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 258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 259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 271

关于殷周关系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 283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 285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 289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 295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 297

引用书目 / 302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 305

一、问题的提出 / 305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芽 / 306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 311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 317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 317

二、儒家的孝学说 / 322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 334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 338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 338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 343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 348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 355

-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 356
-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 358
-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 362
-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 365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 369

-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 369
-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 373
-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 378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 385

-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 386
-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 391

后记 / 400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现在也是一个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而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但是它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的中国历代的“正史”，大多数都继承了《史记》的做法。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这一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严格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的关系。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一词，英文作 comparison，法文作 comparaison，德文作 komparation，皆来自拉丁文 comparo，这个词由 com 和 paro 组成，前者意为“共同”，后者意为“并立”、“平列”等，原有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结合”的意思，引申而为“比较”、“对照”的意思。在中国文字里，情况也很相似。“比”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与“从”字不分，都是两个“人”字并列，所以“比”字原意本是“并列”；《说文解字》把“比”字和“从”字分开（只是两个“人”的方向与“从”字相反），解释说“比，相次比也”。这也就是并列的意思。而“较”字却是“对照”的意思，例如，《老子》第二章：“长短相形”，王弼本作“长短相较”。“形”与“较”（与“校”相通）在这里都是对照、参校的意思。所以，在中国语言里，“比较”也是由并列而引出对照、比较的意思来的。

“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共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ro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以上说到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其实，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